



[第2卷]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美国史

(美)乔治·布朗·廷德尔 大卫·埃默里·施 著 宫齐等 译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美 国 史

[第2卷]

(美)

乔治·布朗·廷德尔 (George Brown Tindall)

大卫·埃默里·施 (David Emory Shi)

著

宫 齐 李国庆 裴霜霜

俞文中 曾光涛 张丽平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广州



PART THREE

第三部分

— ·AN EXPANSIVE NATION · —

扩张的国家

从19世纪早期开始，一股持续不断的迁移潮在美国形成，迁移的大军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跨过密西西比河，在19世纪40年代到达太平洋地区。马车、运河、驳船、汽船，还有铁路帮助运送他们。美国向西部开发新领土的狂热扩张导致美国人与印第安土著人、墨西哥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发生冲突。只有少数人对这种鸠占鹊巢的行为表现出道德上的内疚，多数美国人相信这是美国向整个大陆扩张带来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不惜代价，不惜成本。美国人普遍认为上天会保佑他们去努力巩固对整个大陆的控制。

当多数美国人还在依靠土地谋生时，纺织厂和制造厂已经开始零星出现，它们改变了工作性质和生活节奏。到19世纪中期，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大国之一。此外，廉价土地和大量工作机会的诱惑，还有对政治平等和宗教自由的承诺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欧洲移民。新来者多数来自德国和爱尔兰，他们面临种族歧视、宗教迫害、语言障碍等问题，这使得他们很

铁道横贯美洲大陆，是美国西部开发的成果和象征。

难融入美国文化。

19世纪的第二个四分之一世纪中，美国因这些发展而变得活跃且富有流动性。哲学家、诗人拉尔夫·韦尔多·爱默生说，美国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一个充满计划、设计和期待的国家”。这个时期她的特点是不安分，但富有乐观精神。那些原本已经接受命运的底层人民现在又努力爬上社会阶梯，进入政治舞台中。杰斐逊和麦迪逊支持的贵族共和政体体现在让位于推崇开拓边疆政策的杰克逊式民主¹。美国人开始不满足于受少数有财有能、乐善好施的贵族管理。他们开始要求——并获得——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繁荣的经济环境有助于形成一种平等思想：每个人（除非洲裔美国人、土著人和妇女）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去改善自我，都应该被赋予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1844年一位记者评论说，在美国，“人人都应当能够凭借他的天赋才能、勤俭努力拥有自己的良好机遇”。

在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这样神圣的表达中蕴含着丰富的个人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也在19世纪前半叶渗入到文化领域中。所谓的浪漫主义运动将民主理想应用到了哲学、宗教、文学和美术中去。在新英格兰，拉尔夫·韦尔多·爱默生和亨利·戴维·梭罗加入了其他先验论者行列当中，支持激进的个人主义。其他改革者更多的是受一种精神使命而不是民主的个人主义的驱动。这些改革者努力推动公立学校发展，废除奴隶制，提倡戒酒，改善残疾人、精神疾病患者和犯人的生活，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努力解决了狂热的经济发展和土地扩张带来的一些问题。但是改革者在反对奴隶制方面进展不大，需要一场残酷的战争才能扫除美国这种“特有的制度”。

¹ 即以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为名的政治哲学，主张人民应尽可能多地参与公共事务。——编注

国家主义和地方主义



约19世纪，美国西部移民。

在1812年战争后的一片欢腾声中，美利坚，这个年轻国家开始了她的变革。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涌向西部，庞大的地方经济逐步被卷入全国市场。种植园的棉花种植和奴隶制文化传入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田纳西等原西南部各州，这一切都大大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生活，打乱了原本的家庭关系。同时，活跃的中产阶级开始在北部和西部城镇中涌现并成长起来。这些在经济政策、交通设施以及奴隶制在新领土的沿用等方面急剧的变化激起了广泛激烈的政治争论。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逐渐形成三块实力雄厚的区域：北部、南部和西部地区——此三个地区之间不断变化的联盟关系塑造着美国内战前的政治局面。

经济国家主义

1812年战争之后，美国人经历了爱国主义热情的高涨。年轻的美国正从一个松散的地区联盟成长为横跨美洲大陆、功能完备的统一国家。战争之后异常繁荣的经济带来一片康宁的局面，政府的威信也随之增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托马斯·杰斐逊的禁运法令反而使得他原本厌恶的工厂大量涌现。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家需要农业、商业和制造业三种产业共存发展，这样才能使经济结构更为平衡。在经历20年的战争之后，欧洲的农产品短缺，因此大大抬高了美国农产品的价格，刺激农业扩大生产，实际上，这也引发了疯狂的土地投机行为。南部地区的棉花、烟草和大米占据了美国出口产品份额的三分之二。同时种植园主和农场主在战后市场上到处都可以买到廉价的英国货，因此新兴制造商需要寻求保护以应对国外竞争。

詹姆斯·麦迪逊总统在战后发给国会的第一份咨文中提出了加强政府职能的几个步骤：“加强国家要塞及各项防御工事，建立常备军和海军，设立新的全国性银行，有效保护新兴产业，修建商用、军用运河和公路系统，最重要的是建立全国性大学。”一位新英格兰人这样评价这份咨文：“共和党已经使联邦主义被排除在联邦之外了（out-federalized federalisms）。”国会批准设立万人常备军并加强海军。



联合工厂

位于巴尔的摩县帕塔普斯科瀑布的马里兰联合工厂 联合工厂是1807年禁运期间建立的一家纺织厂，雇佣有600多名工人。

合众国银行 经济领域的国家主义的“三位一体”政策——再次设立全国性银行、实施保护性关税和改善国内环境——引发了最大的争议。1811年第一间全国性银行特许期满关闭后，美国一度陷入财政泥潭。在无人监管或监管不力的情况下，州立银行纷纷建立。银行票据（纸币）和价值不定的通货充斥于各个商业渠道。战争期间硬通货短缺，很多州立银行暂停纸币兑换金属货币（即金或银），又使得纸币价格贬值。中央银行的缺席已经成为政府财政窘迫的主要原因。政府既没有现成的途径发行公债，也无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金调配。

麦迪逊和多数年轻共和党人的务实思想扫除了他们对建立全国性银行有违宪法的顾虑。对于建立一间中央银行的问题，麦迪逊表示已经作出决定，是在“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的法案中已多次论证这一机构的合法性，在全体民众意志一致”的情况下决定的。1816年，国会不顾老共和党人的抗议，采纳了建立新合众国银行的方案。新银行设在费城，特许状有效期也为20年，联邦政府拥有五分之一的股权，25位银行总裁中有5位由政府任命。这样美国银行就成为政府联邦资金的储备机构。政府接受银行票据作为支付手段。作为其拥有特权的回报，银行必须免费为政府管理资金，必要时需向政府提供最高达500万美元的借款，并支付给政府150万美元的现金红利。

这次银行问题的激烈辩论，大大推动了其他经济问题的地区联盟模式的形成。密苏里州参议员汤玛斯·哈特·本顿预言：缺乏货币的西部城镇将任由中央集权化的东部银行摆布。“他们随时会被吞并！就像羊入虎口！一口就会被吞掉！”

围绕合众国银行的争论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也是因为19世纪最伟大的几位政治家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C. 卡尔霍恩、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莱和新罕布什尔州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卡尔霍恩正处于他的青年阶段，是个好斗的国家主义者。他引入并大力推广纸币，并借用国会力量约束硬通货，确立了纸币的合法地位。克莱原来一直对国家银行持反对态度，但他现在称，客观形势使得国家银行必不可少。另一方面，以韦伯斯特为首的反对派——新英格兰联邦派不同意将银行中心从波士顿转移到费城。不久韦伯斯特从新罕布什尔州搬到马萨诸塞州，并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国会，代表更强大的国家力量，而一系列的事件将使卡尔霍恩转向反对国家权利的立场。

保护性关税 1807年禁运期间资金开始从商业向制造业转移，战争期间转移速度加快。1815年的和平使美国突然恢复进口廉价的英国货，人们呼吁实行关税（进口税）保护新兴的美国工业，抵御国外竞争。当时的制造商还没有太多政治影响力，他们追求

经济独立，这一爱国热情更强化了他们的自身利益。但是新英格兰的船商和南方农场主反对实行关税。不过在这两个地区都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派，他们相信通过关税能够推动产业发展，从而增强国家和地区的福利。

1816年国会很快通过了关税法案。起初国会并不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实施关税，而是为保护国内工业，抵御国外竞争。南方地区和新英格兰对此的态度可从投票中看出，新英格兰投支持票，南方投反对票。中部亚特兰大州和老西北地区总共只投了5张反对票。南卡罗来纳的纳瑟内尔·梅肯反对实行关税，坚持老共和党从严解释原则¹（doctrine of strict construction）的做法。梅肯认为：保护工业的权力和建立银行的权力一样，都是以宪法中蕴含的“默示权力”（implied power）为基础的。梅肯担心有一天这种默示权力将用于废除奴隶制。以约翰·卡尔霍恩为首的少数南方人投票支持关税，因为他们希望南方也可以成为工业中心。南卡罗来纳当时正在发展一些纺织厂。根据1810年的调查数据，南方各州的制造商数量与新英格兰相当，但几年后新英格兰将会远远超过南方，所以卡尔霍恩接受梅肯对关税保护主义的看法。到时关税问题将成为地区性问题：制造商、羊毛加工、食品业者、糖类业者和大麻种植者赞成高关税，而棉花种植园主和航运业则赞成低关税。



约翰·约伯·奥斯塔
(John Jacob Astor, 1763—1848)

美国纽约富商，靠皮草贸易起家，也是对华鸦片贸易商人之一。

改善交通 这个时期的第三个主要问题是关于政府对交通发展的支持：修建公路和发展水上运输。现有道路设施的不足在战争中显得尤为突出。事实证明，想在西部荒野地区移动部队非常困难，如果移民不定居在可通航的水路附近，就只能被隔绝在贸易之外，在边疆地区勉强维持生计。

在托马斯·杰斐逊的领导下，联邦政府开始进入交通发展领域。他和他的继任者推行宪法修正案，赋予联邦政府在这一领域毋庸置疑的权力。没有这项权力，宪法所支持的联邦政府的行动只有提供国家防御和扩大邮政系统。1803年，俄亥俄成为美国一个州，国会颁布法令：该州土地销售收益的5%要用于修建大西洋海岸至俄亥俄州的国家公路，随着本州的发展这一比例还将增加。1815年，该公路开始修建。

这条公路最初称为坎伯兰公路，它是联邦出资修筑的第一条州际公路。1818年，马里兰州的坎伯兰到弗吉尼亚州（现西弗吉尼亚）俄亥俄河边的威林段已经开通。到

¹ 即严格解释宪法。——编注

1838年，公路一直延伸到伊利诺伊州的万达利亚。国家公路和其他私人资助的收费公路降低了交通成本，打开了新的市场，推动了农业的商业化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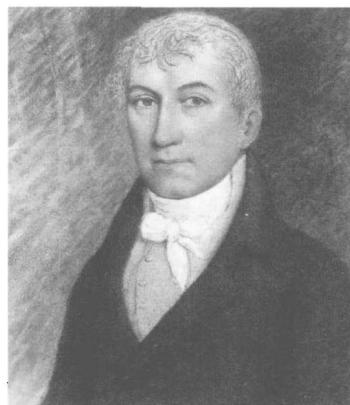
1817年，约翰·C·卡尔霍恩向议院提交了一项议案，要求向交通发展资金中注入一笔150万美元的补助，此款项来自美国银行支付其特许权的资金和未来政府银行存款所获得的红利。反对联邦政府资助交通事业的声音集中在新英格兰和南方地区。他们预计自己未来从西部发展中获利最小。支持主要来自西部地区，他们非常需要优质的公路。麦迪逊总统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天否决了此项议案。虽然他赞成此项议案的目的，但没法克服“将议案与宪法协调一致……所具有的难以克服的困难”，他建议修改宪法。在后来的一百年间，除了几次例外情况，交通发展仍然是州和私营企业的责任。直到《1916年联邦资助公路法》颁布以后联邦政府才得以大规模进入这一领域。

“和睦时期”

詹姆斯·门罗 当詹姆斯·麦迪逊吵吵闹闹的总统任期接近尾声时，他和杰斐逊一样期望一位弗吉尼亚同乡，另一位国务卿，做他的继任者。对麦迪逊来说，这个人将是詹姆斯·门罗。门罗在共和党政党会议中获得提名。随后的1816年大选中，他在选举团投票中以183比34的票数击败联邦派的竞争对手，来自纽约的鲁富斯·金，“弗吉尼亚王朝”因此继续存在。门罗与4位前任总统中的3位相似，也是一位弗吉尼亚种植园园主，唯一的区别是他的种植园规模小很多。独立战争爆发时他还在威廉与玛丽学院读书。他16岁参军，在独立战争中与华盛顿并肩作战，后来与杰斐逊一道学习法律。

门罗曾经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任职，担任过弗吉尼亚州州长，先后在联邦议会和美国参议院任职，担任过美国驻巴黎、伦敦及马德里的大使。麦迪逊担任总统期间，他任国务卿同时担任陆军部长。门罗戴着白色假发、三角帽，穿着及膝短裤。他是革命一代在白宫任职的最后一位，也是最后一位以旧式风格着装的总统。

门罗严格遵循共和党原则为行为准则，他无法跟上新国家主义的潮流。他把美国



詹姆斯·门罗 (James Monroe, 1758—1831)

美国第五任总统 (1817—1825)，1776年辍学参加独立战争，1811年任国务卿，1823年提出美国外交政策方针“门罗主义（门罗宣言）”。

银行和保护性关税作为既成事实来接受，但在其任期，经济国家主义没有进一步发展，实际上还有所退步：他允许继续修建国家公路，但否决了《坎伯兰公路法》(1822)，他否认国会有权对公路收费以支付维修和保养费用。和杰斐逊、麦迪逊一样，他敦促修改宪法以消除所有对交通发展领域中联邦权力的质疑。

门罗周围聚集着一批最有才干的年轻的共和国领袖。约翰·昆西·亚当斯成为国务卿，佐治亚州的威廉·H. 克劳福德继续担任财政部长，亨利·克莱为继续担任议院发言人而拒绝担任陆军部长，此职位后来由约翰·C. 卡尔霍恩担任。新政府期间国家安宁，一片和平景象，经济繁荣昌盛。1817年门罗就职后不久，他展开了一次新英格兰友好之旅。在后来成为反战温床的波士顿，一份联邦派报纸以“和睦时期”为题对总统访问作出评论。这个标题成为门罗政府时期一句流行的宣传标语，后来又被历史学家采用。然而“和睦时期”非常短暂，1819年战后繁荣骤然消失，党派风气和地方主义也突然复苏。

1820年总统在没有什么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再次当选。联邦派实力太弱无法推举候选人。3人弃权，新罕布什尔州一票投给了约翰·昆西·亚当斯，门罗赢得其他所有选票。当时政坛，共和党处于主导地位。不过，共和党就快重蹈联邦派的覆辙，被人遗忘。在政治上普遍满意的时代，第一代政党制度在逐渐消失，很快，在总统继任者的竞争中，新的政党开始形成。

与英国的关系 美国与英国（包括印度殖民地）的贸易不断增加，这更为1812年战争后的政治满意度锦上添花。《根特条约》还遗留下一些小争端没有解决，但接下来的



白宫舞会

绘画：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为安德鲁·杰克逊举行的白宫舞会，是门罗执政时期的一个亮点。

两个重要协约——1817年的《拉什—巴戈特协定》(*the Rush–Bagot Agreement*)¹ 和《1818年公约》(*Convention of 1818*)——彻底消除了激起仇恨的潜在因素。首先，代理国务卿理查德·拉什与英国大臣查尔斯·巴戈特互换照会后，美国将大湖区的军事力量限制为几艘用来征收关税的联邦船只，这一安排使大湖区的海军竞争消失。此次照会虽然没有提及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线，但照会精神带来了世界上最长不设防边界线的传统。

《1818年公约》包括3个主要问题：敲定路易斯安那购地的北部界限，将国境线从伍兹湖（此地后来成为明尼苏达州）沿49度纬线向西延伸到洛基山山顶。此点以西的俄勒冈县将由英美共占，边境问题仍未解决。美国在1783年获得的在纽芬兰和拉布拉多海域的捕鱼权再次得到承认。

公约遗留的主要问题是英国为保护利润丰厚的贸易在西印度群岛驱逐美国的船只。这个问题一直刺痛美国人，对此美国采取了几项报复性措施。《1817年航海条例》(*1817 navigation act*)规定，西印度群岛的进口产品仅限于由美国船只或西印度商人的船只运送。1818年以后，凡在法律上禁止美国船只进入的英属殖民地地区，从那里开出的英国船不能进入美国港口。1820年门罗通过一项国会法案规定，对所有英国船只、英国的美洲殖民地、运送到英国又再次出口的货物，美国均在贸易上实施彻底不往来政策。因此，美国再次亲近英国的行动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边境扩张 1819年是美国历史上更加重要的一年。美国扩张领土的行径颇具争议性，经济恐慌非常强烈，关于扩大奴隶制范围的讨论非常激烈，最高法院又审理了几起标志性案件，所有这些为“和睦时期”画上了一个不安的句号。美国获得佛罗里达地区，其南部、西部边境扩展到太平洋，至此新国家主义达到顶点，但是国家主义很快就开始与国内反对意见相冲突，国家陷入地区间争端之中。

就全球实力来说，人们可能早已认为佛罗里达终有一天会归属美国。西班牙的统治权不过是名义上的，其统治只达到东海岸的圣奥古斯丁和墨西哥湾的彭萨克拉及圣马克地区。在最近几次的战争中，佛罗里达成了美国的肉中刺，因为它往往成了英国策划阴谋的中心；这里也成了克里克土著难民的避难所，他们已经开始被称为塞米诺尔人（Seminole意为逃犯或分裂分子）；这里还成为出逃奴隶和罪犯的避风港。

曾经统治美洲的西班牙现在是一个没落中的国家，她甚至无法履行1795年《平克

¹ 美国代理国务卿R. 拉什与英国驻美公使C. 巴戈特关于限制两国在五大湖上的海军力量的换文。其中规定每个国家的舰艇数目应为：在尚普兰湖不超过1艘，在安大略湖1艘，在北面几个湖2艘；船只的最大载重不超过100吨，配置1门发射18磅重炮弹的大炮。经过一些修改，该协定至今仍然有效，并构成美加间和平边界关系的基础。——译注

尼条约》¹ 中建立边疆和平的义务。1816年美军与一群逃跑的奴隶发生冲突，奴隶们占据了位于阿巴拉契科拉河上的一座英国堡垒。塞米诺尔人不久开始攻击此地区的白人定居者，1817年美国人烧毁了一个塞米诺尔人边境定居点，杀死5名居民，并将剩余的人全部驱逐到佛罗里达境内。

同时陆军部长卡尔霍恩批准一项打击塞米诺尔人的行动，他召集来自纳什维尔的安德鲁·杰克逊将军做统帅。杰克逊受命将入侵者赶入西班牙领土，但不能攻击任何西班牙营地。失望的杰克逊直接向总统门罗请求，如果美国想要佛罗里达，他保证可以在60天内结束所有领土争议。

提到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没有几个田纳西州白人——当然也包括安德鲁·杰克逊——认为打败他们有什么技术难度。杰克逊向东推进穿过佛罗里达，在田纳西志愿军和克里克友军的帮助下占领了一个西班牙岗哨，遭遇到了一群塞米诺尔人，随即摧毁了他们的定居点。他绞死了两位塞米诺尔首领，而后回头向西行进，首先占领彭萨克拉，然后回到家乡纳什维尔。整个行动大约费时4个月，到1818年佛罗里达锅柄状的区域落入美国手中。

杰克逊的扩张行动激怒了马德里，也引起华盛顿方面的关注。西班牙要求美国归还其领土并惩罚杰克逊，但西班牙的孱弱无力是有目共睹的。门罗内阁先是打算否定杰克逊的做法，尤其是反对直接攻击西班牙岗哨的行为。陆军部长卡尔霍恩倾向于至少在官方上以无视命令罪惩罚杰克逊，但私下里承认对这个结果感到高兴。但这个立场导致后来两人交恶。像杰克逊这么受欢迎的人任何时候都是击不倒的，何况他还有一位重要的朋友，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亚当斯意识到杰克逊的行动可以增加自己在与西班牙大使谈判中的筹码。美国军队从佛罗里达撤离，谈判恢复，因为美国清楚自己随时可以夺回佛罗里达。

随着佛罗里达的未来归属已成定论，约翰·昆西·亚当斯把他的目光转移到更大的目标，他最大胆的手笔是划定《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的西部未定边境线，将其边境线延伸到太平洋海岸。在漫长的谈判中，亚当斯逐渐放弃对得克萨斯的领土要求，但坚持要求划定横贯大陆边境线。1819年双方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同意承担美国民间向西班牙索要的高达500万美元的赔款，作为回报，西班牙割让整个佛罗里达地区。《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西部边界以阶梯状划定，边界沿萨宾河向北延伸到雷德河，再沿红河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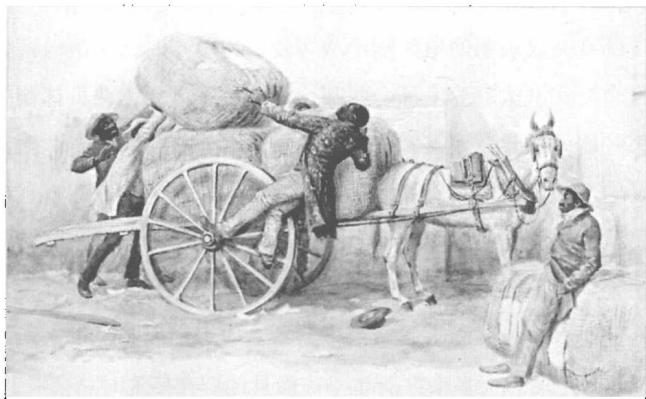
¹ 又称《圣洛伦索条约》(1795年10月27日)。西班牙与美国确立北纬31度纬线为美国南部边界。协定对美国商业有利，美国公民可在密西西比河上自由航行，穿越西班牙领土，并享有在新奥尔良港免税临时寄存货物的特权。双方同意约束各自境内的印第安人不得侵犯对方领土。条约并有尊重公海自由航行权的条款。协约人美方为T.平克尼，西班牙为M.德戈多伊。——译注

北到阿肯色河。从阿肯色河源头，边界线将向北延伸到北纬42度纬线，然后从那向西延伸到太平洋海岸。关于领土权的争端耽误了协议的签署长达两年时间。但这些领土要求被宣布无效，1821年双方最后交换签署协议，佛罗里达成为美国领土，第一任总督为安德鲁·杰克逊，其任期很短。1845年佛罗里达成为州。

危机与妥协

1819年恐慌 约翰·昆西·亚当斯的《1819年泛大陆条约》(Continental Treaty)¹¹是一次外交上的胜利，也标志着战后国家主义达到高潮。但是，即使在条约签署之前，两次重大的事件标志着短暂的和睦时期已告结束，暴风雨即将到来。这两次事件分别是棉花价格的突然崩溃导致1819年的经济恐慌，以及有关密西西比州地位的争议。1818年棉花价格一度激增到每磅32.5美分。高昂的价格使得英国纺织厂从美国转向东印度寻找便宜的棉花货源。到1819年奥尔良的棉花价格平均仅为每磅14.3美分。价格下跌导致对其他美国产品的需求下降，1812年战后繁荣经济突然暴露了其脆弱的一面。

从1815年开始，投机的泡沫不断膨胀，人们盼望经济扩张永远继续下去。同时美国工业艰难地寻找产品市场。1816年关税法的力量也不够强劲，无法消除英国的竞争。而且商人、农民和土地投机者肆意扩大信贷，这更加大了经济泡沫。信贷来源于政府和银行。根据1800年《土地法令》(Act of Land)，政府已经将西部土地购买者的信贷延长4年。1804年以后，个人可以以最低每平方千米0.04美元的价格购买至少0.65平方千米的土地（如果拍卖，最好的土地价格会高些）。在很多情况下，投机者只需支付四分之一的定金就可以



黑人搬运棉花

19世纪后半期，美国查尔斯顿的黑人把已打包好的棉花装上马车。

¹¹ 又称《亚当斯·奥尼斯条约》或《佛罗里达购买案》。1819年美国和西班牙划分它们在北美大陆的主权范围的协议。两国确定的分界线为：从今路易斯安那州东南角起，向北和西延伸到怀俄明州，然后沿北纬42度线向西到达太平洋。这样，西班牙割让佛罗里达和俄勒冈，换得美国承认西班牙对得克萨斯的主权。——译注

买下一大块土地，然后把它卖给定居者，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定居者会分期支付剩余的款项。但是，随着粮食价格暴跌，土地价格随之下跌，投机商和定居者的收入也就急剧下降。

州立银行不计后果的做法也加剧了信贷膨胀。为扩大贷款，银行发行了超过它们兑换能力的纸币，甚至理应为金融市场引入秩序的新美国银行也卷入这种狂热当中。它的第一任行长也陷入席卷全国的“迅速致富”热潮中。这个新的全国银行一时间建立起许多分行，费城方面鞭长莫及，国家银行分行像州立银行一样不计后果，纷纷扩大信贷。1819年，警惕性较高的商人们开始发出警告，一件发生在美国银行巴尔的摩分行的数目巨大的欺诈和挪用公款案曝光。这次事件的曝光推动了对前南卡罗来纳州的议员兰顿·切弗为国家银行行长的任命。

切弗上任以后，降低员工工资及其他开支，推迟支付利息，停止延长信贷时间，赎回回流的州纸币以强制州立银行保留硬币储备。切弗力挽国家银行于将倾之际，同时也把巨大的压力转移到了州立银行身上。州立银行继而将压力转移给债务人，债务人发现续借贷款或获得新贷款变得更难。1822年，切弗认为他的任务已经完成，因此退休，一年后费城的尼古拉斯·比德尔接任。切弗的政策是经济恐慌带来的后果而不是起因，但它的确刺痛了债务人。艰难时期持续了3年，银行承担了公众许多的谴责。债务恐慌过去了，但对银行的怨恨却一直萦绕在南部人和西部人的心头。

《密苏里妥协案》¹ 正当金融恐慌在全国弥漫时，另一片乌云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一场有关奴隶制的地区间论战爆发。1819年时，美国的蓄奴州和自由州数目相当，均为11个。宾夕法尼亚南部、西部州界和俄亥俄河为两种体制的州分界线。虽然分界线以北某些地区仍残存奴隶制，但它已经逐渐消亡。但是密西西比河以西，分界线没有进一步延伸至整个路易斯安那地区，废奴行动并没有开展起来。自从法国和西班牙在此开拓殖民地，奴隶制就已存在。当时的密西西比地区，是《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一部分，包括整个购地案中除路易斯安那（1812年加入联邦）和阿肯色地区（1819年成为准州）以外的所有土地。原法属老镇圣路易斯成为定居者越过密西西比河涌向西部的一条漏斗形通道。定居者大多来自南部——而且他们在拓荒时总会带上他们的奴隶。

1819年人们要求众议院批准一项议案，允许密苏里起草州宪法。它的居民已经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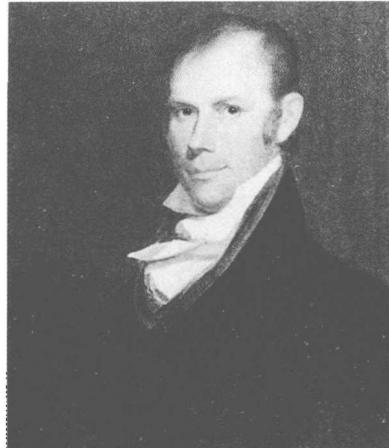
¹ 美国国会达成的同意接纳密苏里为第24个州的议案。在该州申请获得无奴隶限制的州地位后，北方的国会议员试图提出修正案来进一步约束蓄奴，但没有成功。当缅因（最初是马萨诸塞的一部分）也要求州地位时，H. 克莱提出了折衷方案，允许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缅因则作为自由州加入。此后奴隶制在密苏里南部边界以北的领土被废止。克莱的妥协方案似乎解决了延长奴隶制的问题，但凸显了地区间的分歧。——译注

过6万人，达到建立州的最低要求。当时纽约议员小詹姆斯·塔尔梅奇提出一项决议，禁止继续向密苏里州输入奴隶，而且密苏里地区被批准成为合众国的一个州之后要给予在此地出生、年龄达到25岁的奴隶自由。当时密苏里的奴隶数量已经达到约10万人。在简短激烈的交锋之后，众议院投票通过修正案，投票几乎全部来自同一区域。但在参议院的投票中，却否决了修正案，投票也同样具有地域性倾向，但是有几位北方人加入反对一方。即使北方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在参议院中，南北地区的势力尚能保持平衡。但在众议院中蓄奴州拥有81票，自由州拥有105票，票数不可能再恢复平衡了。

缅因地区单独申请联邦州的地位，使得通过密苏里为联邦州的意见趋向统一。从殖民时代开始，缅因就是马萨诸塞北部的殖民区。参议院把该区的诉求与密苏里成为联邦自由州的地位联系起来，最后投票承认缅因为自由州，密苏里为蓄奴州，从而保持了参议院中自由州和蓄奴州席位的平衡。一位伊利诺伊州参议员通过提出一项修正案使得这一妥协的范围进一步加大，修正案中规定，在密苏里州南部边界、北纬36度30分以北，《路易斯安那购地案》领土的其余地区废除奴隶制；也即是奴隶制将在阿肯色地区和密苏里州继续存在，而在其他地区则要废除。人们当时以为不可能会有人定居在剩余的美国大沙漠（Great American Desert）地区，因此这次协调看起来是南部蓄奴州获得胜利。1820年3月2日众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修正案。

然而，另外一个问题随后出现了。主导密苏里准州制宪会议的倾向奴隶制一派在新的州宪法中插入了一条限制性条款：将自由黑人和黑白混血儿驱逐出密苏里州。这明显违反了宪法第4条第2款的要求：“每个州公民均应享有各州公民所有之一切特权及豁免权。”很多联邦州，包括蓄奴州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都有自由黑人公民，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都获得投票权。

新的争议给批准密苏里加入联邦造成威胁，这一情况直到亨利·克莱制订了“第二次”密苏里妥协方案才有转机。方案内容要求，批准密苏里成为联邦州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密苏里立法机构保证永远不能把这条冒犯性条款解释为同意剥夺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这是美国历史中非常笨拙的一次回避做法，因为它要求立法机构承认，州宪



亨利·克莱（Henry Clay, 1777—1852）

克莱28岁即进入参议院，尽管当时议院要求参议院年龄最少要为30岁。

法所表述的内容并不是该宪法想传达的意思。但是妥协起了作用。密苏里立法机构及时执行该允诺，驳回立法机构对人们在州内权利的限制。1821年8月10日，门罗总统宣布批准密苏里成为第24个联邦州。至此争论平息。但经历丰富的托马斯·杰斐逊在第一次妥协方案后，就给朋友写信道，“这就像划破静夜的火警铃声，让我充满恐惧。我马上想到，这是为这个国家敲响的丧钟。”

司法国家主义

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 与此同时，国家主义依然在最高法院中盛行，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使汉密尔顿的联邦主义在又一代人当中推行。马歇尔是经历过独立战争的那一代人，托马斯·杰斐逊的远房表兄弟，他用思想的力量和清晰的逻辑确立起最高法院的权力。

在马歇尔领导美国最高法院的早期（他的任职时间共34年），确立了司法审查原则。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1803）和弗莱彻诉佩克案（1810）中，最高法院首先判定联邦法令违宪，之后又判定州法律违宪。在马丁诉亨特的承租人案（1816）和科恩兄弟诉弗吉尼亚州案（1821）¹中，最高法院行使了接受州法院上诉的权力，理由是只有最高法院可以复审州法院的决定，如此一来美国的宪法、法令和各项条约才能保持一致，美国宪法才能成为美国的最高法律。在第一起案件中，最高法院驳回弗吉尼亚州没收独立战争后亲英分子财产的做法，因为它违反了与英国签订的协议。第二件案件中，最高法院支持弗吉尼亚州禁止销售彩票的权利。



约翰·马歇尔 (John Marshall, 1755—1835)

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是司法国家主义的中流砥柱。

保护契约权利 1819年是意义重大的一年，约翰·马歇尔和最高法院又做出了在确定各州和建立中央政府权力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两个判决，其中之一是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 (Dartmouth College v. Woodward)，在该案中，新罕布什尔州立法机构试图更改达特茅斯特许状中规定学院董事会为永久存在的管理者的条款。1816年亲共和党的州立

¹ 在该案件中，最高法院重申它有权对州法院涉及有关美国宪法或法律引起的案件中做出的所有判决进行审查。1789年的联邦法院组织法规定，最高法院必须对任何州的最高法院在下列案件中作出的终审判决进行审查，这些案件包括“对美国的一项条约或法规的有效性发生怀疑而判定其无效的案件”或“以违反美国宪法、条约或法律为理由对任何州的一项法规发生怀疑而判定其有效的案件”。——译注

法机构对达特茅斯学院这个君主立宪制的遗留物，尤其是董事会中联邦派占多数的事实感到不快，遂将达特茅斯学院置于州长任命的董事会下管理。原来的董事会提起诉讼，但在州法院败诉，他们随后上诉到最高法院，经过律师丹尼尔·韦伯斯特的雄辩，在最高法院获得胜诉。马歇尔在判决中指出，特许状是有效的契约，立法机构损害有效契约的做法是为宪法所禁止的。这一判决意味着“契约”有了新的定义，涵盖的范围更大，使得私人企业不受颁发特许状的州的限制。此后各州通常都在特许状或普通企业法律中写入公司条款，以方便条款的更改。这样的条款便属于“契约”内容的一部分。

加强联邦政府的管理 1819年最高法院的第二个重要案件是约翰·马歇尔对宪政制度最重要的一次解释：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McCulloch v. Maryland*）。国家银行巴尔的摩分行职员詹姆斯·麦卡洛克没有按马里兰州法律在纸币上贴上税收印花，因此他被马里兰州起诉。作为银行利益的代表，他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一致判决，国会有权向银行颁发特许状，州没有任何权力向其征税。对于马里兰州认为联邦政府是各州主权产物的观点，马歇尔以长篇论述进行反驳。他称联邦政府直接产生于人民，按照宪法认可的公约行事。虽然主权分属于州和全国政府，但后者“尽管其权力受到限制，但在其权力行使范围内是至高无上的”。

马歇尔之后承认联邦政府具有宪法的默示权力这一法律原则。他认为，“必要而合适”的法律条款并不意味着“绝对必要”。他认为实践才可以检验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如果目的是合法的，且在宪法范围内的，则一切适当的手段，凡是合乎该目的、未被宪法禁止的、符合宪法文字和精神的，都是合乎宪法的。”

马里兰州向国家银行征税的做法与国家的最高法律冲突。马歇尔写道，“贯穿整个宪法”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宪法及依照此宪法制定的国家法律至高无上：这一体系控制着各州宪法和法律，而不能反过来受其控制。因此州向联邦银行征税的做法是违宪的”，因为“征税的权力包含着毁灭的权力”——这正是马里兰州议会和其他几个州的立法机构行为背后的危险性。

调控州际贸易 约翰·马歇尔的最后一次重要判决是吉本斯诉奥格登案（*Gibbons v. Ogden*, 1824），此案确立了联邦政府在调控州际贸易时的至高权力。1808年罗伯特·富尔顿和罗伯特·R. 利文斯顿（杰斐逊1801年派出的驻法大使）率先将蒸汽船用于贸易，他们从纽约议会获得纽约州水域蒸汽船的独家营运权。而艾伦·奥格登从他们那里获得纽约州至新泽西州之间哈得孙河上的唯一航运权。然而在联邦许可下进行海岸贸易运营